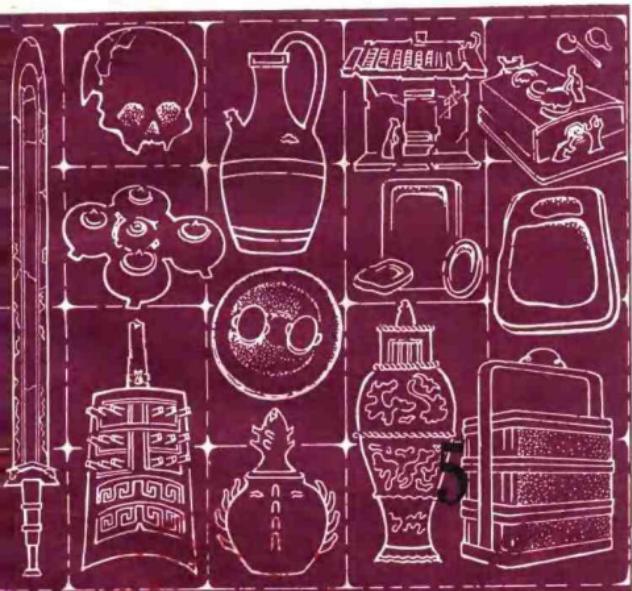


19107

肇庆文史



政协肇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印



编者的话

《肇庆文史》第五辑，原计划应在1987年第一季度出版，后因种种原因，致稽延时日，直至现在才与读者见面，请原谅，并向撰稿人深致歉意。

本辑共收集25篇约共83,000字，其中：《广东鼎湖山庆云寺初祖栖壑和尚祖训》一文，承庆云寺释蕴空太和尚提供寺藏抄本，对研究鼎湖山庆云寺的历史是有所帮助的。《唐代端州刺史林苇的两块石刻在其故乡福建省莆田县被发现》一文，是福建省莆田县政府办陈容明同志为我市提供研究唐代历史而专门撰写的资料，并附该两块石刻的照片。《莆田发现唐“九牧林”林苇石刻》一文，是转载福建省莆田市《兴化报》报道的“文博”消息，也是陈容明同志惠寄该报给我们的。《徐绍桢》一文，是由一位旅香港爱国人士惠赠原文复印本，现将原文刊登，这对研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史提供有关资料，可资参考。

本辑刊登了有关我市工商行业及土特产介绍的资料8篇，为研究我市在解放前的工商业及土特产的兴衰，提供参考。也刊登有关历史人物、古迹、文化、教育、税务及慈善团体等资料12篇，南明史料1篇，资料较广泛、丰富，都具有研究参考作用的。

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高瞻远瞩的创举。从全国、全省和我市的文史资料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意义。现在，文史资料工作已发展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体系，在为“三个服务”（即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服务、为广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广东省出版物印刷许可证

第 304 号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

字数：83,000 工本费：1.15元

肇庆新华印刷厂承印

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具有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近、现代史中，凡是参加或支持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主张民主进步，对国家民族有过贡献，在事业上、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士，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不管他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我们都要肯定其历史功绩和地位，都可以征集和出版有关他们的史料。在记述和评价历史人物中，必须坚持周恩来同志对文史资料工作提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指示，唯有真实，才有历史研究价值，才能教育后代，这是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叙述和评价，不要用现代化标准去要求前人，也不要将前人加以现代化。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要简单化、公式化。归根到底，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我们所要征集的文史资料，是以近代和现代史料为主，以“三亲”（即亲身经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同时也可结合我市的历史特点，征集一些专题史料。时间是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至解放前夕为基本界限。因此希望今后撰写史料的同志和各方面人士都以“三亲”史料作为重点，使我们的文史资料质量进一步提高，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关于今后的文史资料征集的范围、重点和主要内容，市政协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作了具体布置，请按这个布置惠稿。

李荣楷

1987年4月8日初稿

1987年9月20日修改

目 录

陈济棠治粤见闻	黎国庆	(1)
一九三八年肇庆开征所得税	黄升平	(10)
肇庆解放前的银铺和金银手饰铺	翟辉怡	(12)
略谈肇庆解放前的工业		
和手工业一些情况	苏君藻	(13)
解放前铸造业在肇庆的兴起	翟辉怡	(16)
解放前肇庆家用陶器生产	翟辉怡	(19)
肇庆土特产品	翟辉怡	(22)
驰名中外的高要特产		
文罗鲤、麦溪鲤	翟辉怡	(27)
解放前肇庆的饮食业	翟辉怡	(30)
肇庆第一家茶楼 —— 倚岩楼	翟辉怡	(32)
略谈抗日战争时期		
肇庆地方报纸	苏君藻	(34)
解放前肇庆地方慈善团体	翟辉怡	(35)
梁寒操略历	邝肇星	(36)
黄花晚节吐芬芳 —— 记爱国		
民主人士梁孝郁先生	黄升平	(40)
“四·一二”后蒋介石		
对革命的残酷镇压	李廷芳	(42)
陈济棠的变幻	李廷芳	(47)
螳臂挡车的李云霈	范则冠	(48)

- 梧州培正学校与恩达医院 李廷芳 (50)
- 广东鼎湖山庆云寺初祖
 栖壑和尚祖训 庆云寺藏 (52)
- 来自端州古城的信息 谢子熊 (54)
- 广爱亭楹联匾额拾遗 谢子熊 (57)
- 南明永历王朝史略 邝肇星 (58)
- 转载：**莆田发现唐“九牧林”
 林革石刻 林元柏 (69)
- 唐代端州刺史林革的
 两块石刻在其故
 乡福建莆田县被发现 陈容明 (70)
- 徐绍桢 (74)
- 政协肇庆市第一、二、三届委员会情况纪实 李荣楷 (82)

陈济棠治粤见闻

黎国庆

1929年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党政军扩大联席会议（编遣会议），下令撤销各地政治分会，实行独裁。遭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反对，蒋扣留李济深于汤山。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通电反蒋，要求立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政治分会权力。不久，蒋下令讨伐李、白。蒋介石任宋哲元、刘峙，韩复榘为一、二、三路总指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派兵进攻，张发奎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军败退。蒋为彻底消灭桂系，一面派兵穷追，一面以金钱官位诱通粤军第一师长陈济棠，任陈济棠为国民革命军讨逆第八路总指挥，直捣桂系广西腹地。1929年6月31日陈济棠粤军乘虚进占广西。

同年九月，张发奎复任第四军军长后在宜昌通电讨蒋。后转入广西，与李、白联合，旋引兵南趋广东。同年11月21日陈济棠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进攻，并占梧州。

1930年5月1日，陈张之战，后以张军不再攻粤，陈军不再攻张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于同年5月11日，张发奎通电挥师北上讨蒋，于同年6月1日张军攻占了长沙、岳阳等地。从此，粤局告定。陈济棠开始八年治粤的里程。陈的治粤是实行集权制，以总司令兼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统握军政大权。

(一) 军事方面：

(1) 整编扩大军队：

1931年6月间，陈济棠乘蒋介石与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增之机，扩编军队。将八路军改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以缪培南为参谋长，将原有的第一、二、三师扩编为一、二、三军。仍任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为军长，扩编陈汉光的警卫团为警卫旅，扩编缪培南的教导队为教导师；另设立陈维周（陈济棠的哥哥）的盐警总队（等于师的编制）；集编各地方团队为八个保安团。全部兵员统计约十五万人左右。由于军队各级吞吃空缺颇大，实际人员约十万人左右。

由于雇佣兵是强拉壮丁和诱骗来的，待遇低薄，加之体罚虐待，时有逃亡。虽有逃亡者一律就地枪决的严令，仍遏止不了逃风。

军纪松懈，各级军官佐勒榨敛财成风，在驻防地包烟庇赌，藉清乡之名，诬良为匪，敲榨民财。强迫乡保甲长摊派剿匪军粮。民谣云：“贼过如梳，兵过如篦”。

兵丁来源，除一部份是强拉壮丁和向乡村保甲摊派兵额外，另一部分是市井无赖、输光赌徒，叫拉“猪仔兵”。由各部队自行雇请一批“捞家”、“打手”。专在赌场出没，见到有些无钱赌注或输光的赌徒，借钱给他们赌博，如赌胜还回借款，赌败不需还款，只跟招兵的人去当兵就是了。招来的兵，囚在“猪仔”屋里，等凑足人数，用绳扎臂成串，用武装押解到各部队，由部队军官验收，每丁若干元。还有一些叫临时“猪仔兵”，各级部队主管官平时大量吞食兵额，一遇到上级派员到队点名发饷时，临时雇请人冒名顶替，点名过后立即解雇。因此，兵丁素质甚劣，民谣云：“好铁不

打钉，好仔不当兵。”

(2) 培训军事政治人才。

在1930年7月17日，蒋介石命令停办黄埔军官学校，由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派员接管。陈济棠于同年12月，将原军官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1931年秋扩设广东军事政治学校于广州燕塘（简称为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任杜益谦为副校长，以前第八路军教导队为基础，任一批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军校毕业的军官为教官，聘英国军官两名、德国军官三名为顾问，政治教官则在行政军官中担任。分军事政治两大系，军事系分学员队和学生队，学员队是调各部队的现行军官轮训，六个月为一期，学生队则招收高中毕业生1200名，范围是18至22岁男学生。设步、骑、炮、工四个兵种，学制三年，毕业后派充部队任排长。每天三操五讲，要求严格，军事课程全部采用日式为主，间有德国英国式。新式武器方面，向德国购进七九步枪3000枝，西门子电话机50台，向法国购进士乃德7.5厘米口径山炮12门，向英法购进维克斯7.5厘米口径电动高射炮12门。除军事训练外，还有思想教育，内容灌输陈济棠个人崇拜为中心教育，一切以陈总司令训话集和陈总司令言行录为准绳。《孝经》及“四书”是必修科，由清朝的举人秀才讲课，提倡忠、孝、节、义。

学生入校后，必须加入国民党，入党仪式像黑社会堂口拜把仪式，选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学生整队进入广州白云山瘦狗岭第一师坟场，在纪念碑前列队，也不挂孙中山遗像，祭坛上供奉牲猪牲羊，点燃香烛，向阵亡碑三鞠躬礼后，由学生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遵奉三民主义，绝对服从陈总司令，不怕牺牲，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如有违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此誓。”宣誓毕，由监誓官赐滴有鸡公血的

酒一小杯，宣誓人一饮而尽。

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行礼如仪后，必由政治部主任大讲如何统治国家，德国如何称霸欧洲的事迹。有时陈济棠对全校员生训话，讲的如何施仁政，教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是信口开河，从来没有演讲稿，印在讲话集里的文章，都是秘书为他重新编写的。32开不定期出版，广为赠阅。

政治系分行政政治班和政治深造班，行政班轮训科级以下人员，深造班轮训县长级人员。主要课程都是现实性的科目，怎样去奉行贯彻陈总司令治粤的方针、政策、法令。颁行保甲制度，新田赋及其附抽项目，各式各样的捐税、地方库及省库的划分，田亩土地清丈，以旧礼教为中心的移风易俗，内包括取缔奇装异服，男女分校分教，粤剧不准男女混合组班，提倡读经，尊崇孔孟……等项目。

1931年8月设空军学校于广州二沙头，任黄光锐为副校长，任丁纪徐为总教练，向意大利购进一批双翼战斗机，招收一批高中毕业学生训练驾驶战斗技能。陈济棠的空军实力，都是由这间学校发展起来的。至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前，黄光锐率领全部飞机投蒋时，各大杂会飞机型类的数字已达230架。

1931年1月设海军学校于黄埔，和空军学校一样也自任校长，派张之英为副校长。分轮机、驾驶和战斗两班，向意大利购进小型双管鱼雷艇4艘。改革旧陆军测量学校，重新测绘广东全省军事地图。设立警官学校于广州大佛寺，训练一批警官和警士。

（二）政治方面：

（1）增强行政机构，控制广东省政大权。

1929年5月1日，蒋介石任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的同时，也任陈济棠为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省政府并无实权，一切用人行政统归陈济棠掌握。陈任林翼中为民政厅长，区芳浦为财政厅长，开始整顿行政，财政机构，绥靖公署以军法代替司法，对军民人等可直接裁判徒刑或死刑。各乡区县长摄理民刑诉讼，都设有法庭，监狱、行刑队等专政机器。实行清乡运动，军、警、地方团队一齐出动。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公报私仇、诬良为匪、敲榨勒索、层出不穷。而真正匪首如东江的袁虾九、西北江的罗鸡雄之流，不仅秋毫无损，反而势力日增，因为许多良民迫上梁山。土匪不仅有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平射炮等新重武器。剿匪越剿越多。社会出现一个新行业，去当“捞家”。冒险捞一笔财来苟延性命，匪徒自量抢劫、掳人质、还在各江河道、山隘要道设站勒收行水，堂口如麻，商旅艰难。

农村由于田赋太重，兵、匪灾难交叉为害，迫使壮丁弃农外流，田园废耕，每年依靠大量安南米、暹罗米进口，以维民食。

广州治安紊乱，偷窃、扒手遍布，夜间偏僻街道经常“割死牛”（注：匪徒用刀枪威逼行人交出身上财物。）警察、侦人员与匪徒互相勾结，划定地盘范围，赃款分成。

“侦缉老爷”是黑社会最吃香的人物。政府要被人打“荷包”责令侦缉破案，无不依时原物归还。每个侦缉又有其私人委派的爪牙，叫“驳脚侦缉”。穿唐装衫束丝绸带，怀短手枪的侦缉，满布市区，做生意的人尤其开茶楼戏院的或稍有财富的人，无不结交或雇请他们作保镖。拐卖儿童妇女，迫良为娼，掳人勒索，谋财害命等时有所闻。陈济棠出入，也加强防卫。他坐的小汽车两边有跨弹装备，汽车两旁脚板分别

站立三个扳起驳壳枪“鸡头”的卫兵。前有开路汽车，后有殿后汽车。

由于官吏包揽司法诉讼，民、刑纠纷，有法不依，钻营官府，说情、行贿是诉讼必由之路。民谣云：“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官僚、地主有讲求风水，争霸水利，乡村地界，姓氏挟仇等纠纷，挑起村乡械斗，官府便乘机敲榨勒索，故意拖延纠纷。

判刑标准，看后台大小，金钱多少为依据，有时片言可以折狱。1931年广州发生一宗黄文舒碎尸案：一个18岁的执信学校的女学生，被陈济棠一位副官诱奸成妾。副官之妻黄文舒预谋刀杀其妾，并碎尸抛进白鹅潭。这案按法主凶该判死刑。但陈济棠妻莫秀英怕陈娶妾，使其吸取教训，出面干预，改判徒刑。

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开庭审判就秘密处死。1934年1月，十九路军退出福州，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徐铭鸿请求陈济棠给予回广东避难，陈亦答允，陈等徐抵普宁县时，陈立电该县长把徐就地枪决，连徐在就义前预树下自己的墓碑——“社会主义者徐铭鸿之墓”也毁掉。

1930年6月，陈济棠提倡读“经”，凡中等学校以上，定“四书、五经”为必修科。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极力反对，并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秀才、举人，宿儒、道、术士，风水相命先生等云集司令部为上宾乡客。有些儒生穿起军服佩带上校或中校军衔，横直皮带，并佩带登楼证章（注：登楼证可直接登上陈济棠的办公楼，无需传达引见。）出进大门口时，卫兵举枪敬礼，宿儒脱帽彬彬有礼行鞠躬回答。

陈济棠深信风水，以其哥哥陈维周为首，吕祖道的道师翁半玄是他入幕之宾，凡有关军政疑难，求教于道坛扶乩，得吕祖示乩，如获至宝。

陈济棠派出风水先生，四面追龙寻穴，后来在花县芙蓉障地觅得佳穴，乃洪秀全祖坟，已被清朝灭坟湮没。陈济棠迷信翁半玄谎称什么“龙气仍盛”，乃大兴土木，并开辟公路专线直达。将其母骨骸移葬。葬礼之日大小文武官员必须参加，大排酒宴，重金礼聘全国名寺高僧、道观道士，打醮、开坛，平民参加旺山者，除供来回舟车费，膳宿费和丰盛的湮食外，还每人封回“利市包”毫洋五元。盛况空前。

陈济棠以旧礼教治粤，恢复旧礼教，特设立社会局，派简又文为局长，专司其事，民间把简又文之名串成一联以讽之：“城隍庙改为国货商场毋乃太简，惠如楼强迫女伶佩花又属不文”。

陈济棠在推行礼教的同时，为了扩大花捐税收，各地大量增设“老举寨”（即妓院）。最有名的大寨设在广州的西关陈塘区，东堤区、珠江河的紫洞艇。顺德县陈村也是妓院林立之区，嫖、赌、饮、吹式式具备。妓女、烟花不下万人。迫良为娼的层出不穷。官僚、政客、地主、殷商，作为交际应酬场所。另外还有一种高级妓女，美其名为交际花，专钻营穿插在官僚富商之间，供其淫乐。此与礼教背道而驰。妇女有正当职业者被污辱歧视，在机关当女职员的叫“花瓶”。

市镇乡村吸鸦片烟馆林立，门口挂一块门帘，写着“戒烟室”或“谈话室”，因已向政府纳税，吞云吐雾，不受任何干扰。

（2）增收田赋，广辟捐税，兴办工厂以充军费：

1929年田赋征收，实行丁米统征新税，新税率比原税率增加征收百分之七十二点七七。

1931年5月设广东田亩土地测量学校于广州燕塘，训练测量技术人员，在同年12月各县设土地局，办理田亩土地登记事宜，凡地有主，有主就有税，设田亩陈报处，责成各乡长查报所在田亩，由省财政厅派员分别评定田亩捐。每亩值百抽一，县级加征田亩捐每亩毫银一毫。随粮带征，即丁银一两加征毫银三元，并追溯至1930年起加征，因此，田赋每丁银一两，统完毫银至11元（即每亩征收毫银三毫八仙）。地主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1930年从德国购进一间制糖厂，设在顺德县沙头，任冯锐为厂长。把桑田改种高产瓜哇甘蔗。由政府收购。对发展广东糖业有一定贡献。后来由于糖厂成本高于进口洋糖，无利可图，陈济棠下令停产，干脆购进洋糖，改装为“五羊”牌色装袋出售。民谣称他为“无烟糖厂”，所产的“五羊”牌砂糖叫“无烟糖”。

1930年世界经济复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广东，正是外国资本家垂涎欲滴之市场。洋货如潮涌进，无孔不入，城镇大小商店成了万国百货供销店，而本国工商业一蹶不进。硕果仅存的顺德蚕丝业，沦于破产。顺德女子绝大多数赖养蚕缫丝自食其力，历史上有不落家之风，（注：即女子出嫁不回夫家。）蚕丝倒闭后，此风已绝。大批女工外流到都市为家庭女佣。

危在旦夕的工商户，资金周转不灵，只得求救于高利贷。外商品销售后，要外汇回笼。因此十三行的银铺钱庄，象雨后春笋。向银号贷款利息高达月息大一分。炒卖港币的叫“剃刀门楣”，意思是出人都受刮。价格起跌每分钟都不

同。还有黄金外币买空卖空市场，人群疯狂地进行变相赌博。

1931年还开办西村水泥厂，因机械陈旧，耗能量大，兼之要用火车往英德运原材料，加大成本，所产“五羊”牌水泥质量比不上香港清山水泥，因此，也陷于半停产状态。

1931年，耗资巨万与德国马克敦公司签许修建横跨广州河南两岸的海珠铁桥，这笔专款是陈济棠截留海关“关余”不缴南京政府的。（注：关余，是清朝政府向外国贷款，以海关作抵押由外国派员监管，每年将海关收入，绝大部分归还贷款，余剩的部分叫关余，交回中国政府）。“海珠桥”三个大字，是胡汉民书写的。这桥中段可以开关的，以便高桅船只通过。并兴建珠江大桥，只建了几座半截桥墩便停止了。现仍可见其遗迹。

陈济棠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靠税捐，而税捐中最大宗者是盐税、赌捐、烟税。陈济棠任其兄陈维周为两广盐运使，垄断两广盐务，并编有装备精良的盐警总队。

1931年陈济棠向赌商富户霍芝庭借款，以赌捐作抵押。广州河南裕泰公司的牌九番摊，在河南一带星罗棋布、赌徒蜂涌，通宵达旦。还有各地的字花会，山票、铺票、白鸽票等满布城乡，赌风盛极一时。

陈济棠为独揽广东经济，任霍芝庭之子霍宝材为广东省银行行长，印发行银毫券钞票（俗称“金鱼黄”），面额有一元、五元，票面有霍宝材签名。

开征各项捐税、花捐，凡当妓女必须领牌，按牌缴税，每次妓女出局要买出局票，留宿捐。茶楼酒馆办酒席要抽筵席捐，值十抽一。屠宰税、猪、牛、羊、狗屠宰时一律抽税。开店要抽营业税，拜神用品要抽冥强捐，粪便要抽粪捐，

房屋要抽税，租房要抽房捐，无论什么民间契约收据一律要降上印花票，烟酒印花税值百抽五十。民谣云：“凡物皆有税，独有屁无捐”。

社会上出新行业——捐棍。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与达官贵人有关系的人，乘机发财，承包各种捐务。有委派和开换两种承包形式。委派都是与达官贵人有关人物，他不用本钱，收多少缴多少。开投就需凑足承包金额，中标后一次或分次预缴承包金额，盈亏自负。

以上是陈济棠治粤八年时期所见所闻的事情，供研究参考。

一九三八年肇庆开征所得税

黄升平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财政部，一些有正义感的人，鉴于财政税收腐败，贪污受贿之风不绝，很想改革税制，把中国当时侧重于间接税（如印花烟酒税之类）逐步转到实行一些直接税（如薪给报酬所得税、营利事业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等），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不久，成立了财政部所得税处，处长高秉坊（解放后还留用了他）。

肇庆也是从1938年开始才有所得税这个名称，但据我所知只在宣传及申报阶段，未有全面开征，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即撤出肇庆。

我是1938年4月在广州市，广东所得税事务处公开招

考中被录用的税务员、税务助理员（或称高级税务员，初级税务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税务要“用新人、行新政”，刷新改革税制而公开招收大学生、高中及专业会计人员的。

4月我在广州学习了一星期的新税制后，派来肇庆所得稅办事处。

当时肇庆成立所得稅驻肇办事处，主任是叶猛可，税务员程员灝、税务助理员黄升平、何万桐等四人，所得稅的领导是垂直于所得稅处，隶属于中央财政部所得稅处（地方税捐属省财政厅管辖，货物税，直接税“所得稅”则直属于中央财政部管辖，不受省财政厅及当地县政府管辖）。

1938年4月我和何万桐派来肇庆后（一共连主任才四人），肇庆还未全面开征所得稅、而营利事业所得稅（即工商税）也仅在申报阶段。

当时所得稅所谓实行新税制，征收与经收分立，即稽征机构是所得稅处，经收机关是邮局代办。所得稅处不直接收税款，这是中国在税制上一个改革。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华南、广州市沦陷于日寇。当时肇庆人心惶惶，1938年11月初所得稅处的四名职员全部撤走，从西江直上梧州到遂溪麻章集中（省所得稅处也撤到那里），1938年12月由主任叶猛可和我两人，回到罗定县，也在宣传联系及申报阶段。不久，于1939年2月宣布撤销机构。

当时的所得稅亦即是直接税。1938年开征是营利事业所得稅、存款利息所得稅、薪给报酬所得稅、至于财产出卖、租赁所得稅，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开征。

我于1941年在韶关广东高等法院会计室工作时才知道直接税局设立货运登记室、检查站，利用检查站扣留货物、放